

关注

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阻击战中,无数医务工作者无畏出征,勇往直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仁心,为每一个生命守卫站岗。中国医生什么样?纪录片《中国医生》通过跟踪拍摄一个个有温情、有责任、有矛盾、有希望的医患故事,带我们找到答案。透过蒸汽笼罩的防护镜、写满加油的防护服,这个春天,让我们用心的目光去重新打量……

——编者

在当代如何纪录中国?

□王柯月



进入新世纪以来,纪录片在当代中国文化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而其关注话题、叙述方式和制作技巧也更加丰富与多样。尤其伴随着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国内的兴起,纪录片不仅为官方媒介所青睐和使用,更依托主流媒体、自媒体和网络流媒体平台逐步走进了中国观众的日常生活,和影视剧、综艺节目等一齐活跃在他们的微博和朋友圈里。

“纪录片”与“非虚构”的流行,其动力之一便是当下对“纪实性”的呼唤、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照、对现实题材文艺作品及其现实主义精神的诉求,这也意味着对纪录片创作者所秉持的制作理念与价值观的某种检视,因为这关乎“真实”是如何被讲述和形塑的,这种“真实”又在何种意义上与我们的日常现实和精神生活相互关联、相互作用。2020年春节其间,9集纪录片《中国医生》的热映和热议,不仅仅因为它所聚焦的“医生”群体恰好“遇上了”医患冲突频发和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危机的“现实”,更是因为它透过医生群体这一媒介,以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记录下当代中国的“现实一种”。

“纪录什么”、“怎么纪录”和“为什么纪录”是看似简单却始终围绕着纪录片创作的几个核心问题。《中国医生》的中心词是“医生”,纪录的“对象”自然是医护人员,当镜头游走于医院大楼的各个角落,从心脏外科、妇产科、肿瘤科、整容烧伤科、麻醉科到ICU等不同的科室,从巡查、会诊、手术、换药到值班等各个环节,镜头调度自然老练,解说词清晰简练,由白色墙壁、白色外套和蓝绿色工作服所构成的清冷色调,无一不呈现出从事这份现代“职业”所要求的秩序感与分寸感,所必备的冷静、沉着与精准的素质。那些几近天书般陌生的专业术语、紧跟字幕才能勉强厘清的治疗方案,反而让普通观众因其从业难度陡增敬畏之情,从而也平添了安慰与安心。正是通过这些画面,我们看到了21世纪里,以这些全国各大城市公立三甲医院所代表的现代中国医疗技术的巨大进步:整洁明净的病房,规范化、高效率的就诊和治疗流程,配合默契的医疗团队,快速及时的绿色通道和六小时生命圈,高学历高素质的医生队伍,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功案例和国际性手术直播等等。这份内在于纪录片媒介属性的专业性,对中国国情的再现,自然是某些“职场剧”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得以目睹诸多被“神话”的现代医疗之“不能”:既有至今仍然无法被攻克的血病救治技术难关,也有城乡之间医疗资源的巨大差异,致使公立医院的专家们不得不在高度紧张的日程中抽出时间送医下乡、巡回出诊和讲座,高昂的医疗费用和仍然有所欠缺的救助和保障制度,对挽救生命和恢复健康造成重重阻碍,医生甚至要亲自为患儿筹集款项等事例,都是当代中国某种结构性矛盾的显影,其反思意味不言而喻。“技术”与“医德”是这份职业的一体两面,夹在技术和病人之间,永远无法被量化计算的是“人心”与“伦理”。

此外,《中国医生》也罕见地将镜头对准了现代工作制度之外,中国医生们的私人空间和身份转换:屈指可数的下班时间,严重被挤压的家庭生活,见仁见智的收入阶层。当他们脱下白大褂,走下手术台,或骑着一辆略显单薄的电动车穿行在夜色人流之中,或在家人目光注视下狼吞虎咽吃一碗家常面条,或久违地围坐在烧烤摊前休闲,虽然再平凡不过却色调丰富的画面,与工作场景的单调紧张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上一秒小女儿哼唱旋律的背景音与一个电话又被召回岗位的镜头剪辑,诸种细节的捕捉、选取和艺术加工则是“纪录”的另一重张力之所在,也显示了创作团队对医生群体所倾注的某种人文关怀。

就叙述立场而言,《中国医生》在现实主义的旨归下,设置了平视的观看位置,医生并不因为主角便垄断了全部的话语权。而对于当代观众来说,如何去“观看”,也变成了一个需要学习乃至训练的过程。习惯于插科打诨、娱乐消遣和过度编排的中国观众,面对严肃的话题,朴素的成色、剔除戏剧化演绎与引导性煽情的影像,如何做合格的“观看者”并辨认出自身在这一现实中的位置,由此产生共情和共鸣,而不是做一个只动动手指、一味苛责和冷漠的“看客”,也是这部纪录片交给我们的功课与挑战。

透视医疗“本真” 烛照社会心理

□卞芸璐

如果不是疫情突袭,纪录片《中国医生》大概率不会在春节期间跟观众见面。这组以医护群体为主角的纪实叙事,直面医疗现场,沉重又揪心;透视医患关系,共情夹着矛盾;探讨生死观,豁然又难免无奈。在日常节庆的气氛下,它多少显得格格不入。但大疫当前,紧急协调上线的《中国医生》成了调节社会心理的阀门。

《中国医生》不是为了抗疫而生。和《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记》这样因时而动的抗疫文艺作品相比,制作周期超过两年的《中国医生》既给不了观众迫切需求的战疫实况,也没法展现非常态下医护工作者的壮举。若论疫情直接信息,它甚至比不上“央视频道”上24小时直播的“火神山”“雷神山”建院进度。

但就是靠着这一份超越性,这一重对医护群体日常的关注,《中国医生》向观众展现了医疗系统的本真面貌:医学的有为和有限,疾病的凶险和顽固,医护工作者的无畏和无助,患者的茫然和痛苦……这也是《中国医生》的社会价值所在,面对重大疫情,人们对医疗体系的了解和认同与信息公开同样重要,是凝聚社会向心力的重要内驱。

《中国医生》能够深刻作用于当下的社会心理,题材重大、恰切自是原因之一。但真正让观众获得共情体验并最终实现心理认同的,还是作品朴拙的纪录理念和克制的艺术手法。

“真”是纪录片的生命线,但又是一个无法触及、只能无限接近的标准。从创作美学的角度来说,想要靠近“真”先要辨清“事实和真实”“理念和真”这两组概念。

“事实”是发生过的人与事,“真实”是记录者重塑的新现实。前者靠记录、搜集,后者则需筛选、重组。重塑真实的过程,是单向度的“理念”先行,还是以还原复杂、矛盾但与生活同构的“本真”为方向,决定了纪录片“真”的程度。

《中国医生》显然选择了向“本真”靠拢。这部纪录片镜头下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有强大的职业信念,但在充满压力和不确定性的现实中,心态常常是矛盾的,选择多少是犹豫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

在《挚诚》一集中出场的朱付良医生,开头就道出了医生所要面对的最大恐惧:来自病人家属的不理解,甚至极大恨意。这种恨跟沟通关系不大,甚至也并非因为对你医术的不认可,就是失去



亲和和过高期待落空后的情绪爆发。面对这种高压,朱付良也流露出无奈。

工作占据了绝大部分心力,生活缺席成了医生的常态。朱付良笑称自己是不敢死的人,40岁出头的主任医师,家庭责任、医疗责任都没有尽到。在中国医院普遍存在的庞大接诊量和救治压力下,他每天都要高强度工作到深夜。这样做的健康风险他十分清楚,但矛盾之中,他也不知道该如何两全。

这一集的结尾是一组质朴的无对白镜头。下班回家的朱付良,刚吃完饭就接到急诊电话。镜头跟着他的背影,一路小跑着下楼,来到路边。出租车载着他到了医院,来不及换上白大褂,一个不太高大的平凡身影就这样径直走进了急诊抢救室。

虽然有“挚诚”的立意,但主创并没有在旁白中总结性发言。通过耐心地记录医生们的工作状

态和所思所想,亲近、可信值得尊重的真实医生已经被观众认同。积蓄到结尾的情绪只用这一组克制的镜头,便传递出了创作初衷。

在透视医者本真的同时,《中国医生》也有意识地向医学的本真靠拢。这是近年国产医疗纪录片很少触及的层面。

总导演张建珍在创作谈中曾谈及,除了诊疗量和救治压力,患者对医学局限性的不了解和由此导致的对医生的过高期待,是导致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既然要做一部有助于医患建立信任的纪录片,让观众认同医生的同时,认清医学的局限性和疾病的复杂凶险也非常必要。但这并不容易。从叙事角度来说,在一部以医护群体为主角的纪录片中,降格医学的效用,张力难免削减。从文化角度来说,我国民间有流传久远的“神医”崇拜,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很难扭转。

为了反映医学本真,《中国医生》用了一个潜在的重复主题:医生并不总能完全治好疾病。

拍摄心卒急救时,朱付良医生反复强调,真正与这项疾病对抗,一要靠抢救时间,二要靠培养队伍,培养更多掌握这项技术的医生队伍。不是某个医生让患者获益,是技术让他获益。攻克白血病治疗难题的孙自敏医生如今是患者眼中的“救星”,但她也曾经历过血液科工作15年,一位白血病患者没被救活的低沉期。对于得了严重恶性肿瘤的病人,医生或许不能妙手回春,但能想出一点点办法,让生命有质量地延续下去也是治疗。像只能靠长期透析缓解病情的尿毒症患者,想办法帮扶,尽心监督,用互助会的方式鼓励,做好患者长期对抗病魔的心理建设,同样是医者仁心。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中国医生》不仅把医生请下了神坛,也把医学放到了观众平视的位置。当然,这部纪录片也并非完美。各集对比,质量的确存在参差。有的集数为了叙事的形式感牺牲了真实性,有过度戏剧化的嫌疑。有的集数在患者群体的筛选,表现上略显刻板和心理化。不过,整体而言,瑕不掩瑜。

疫情危机之下,《中国医生》用对医疗之“本真”的追求,唤起了人们对医护群体的心理认同,重塑了医疗体系的秩序感。它在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后续的抗疫文艺创作参考学习。

评点

韩国电影《寄生虫》从剧情上说,应以“那场大雨”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大雨之前,豪宅的主人朴社长、朴太太带着儿女多惠和多颂外出度假,为小儿子多颂过生日。而留守在家的女佣忠淑毫无顾忌地招来丈夫金基泽,儿子金基宇和女儿金基婷,如主人般尽情挥霍着短暂“上流社会”的生活体验。其实,在金家四人中,忠淑是最后一个进入朴家的。在此之前,先是基宇受朋友敏赫之托接替出国留学的敏赫,为金家女儿多惠进行英语辅导,女主人朴太太正苦于难以管教性格古怪的小儿子,基宇便趁机推荐了基婷。然后,基婷设计陷害了朴社长的司机,让父亲基泽成功接替,并排挤掉了原先的女佣雯光,使忠淑趁虚而入。至此,原先没有工作的金家四口竟全部在富人朴家找到了工作,且对主人成功瞒过了他们本是一家人的真相。这一刻,与其说豪宅是朴家的,倒不如说是金家的。基婷一边在宽大的浴室洗澡,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喝着上等饮料。基宇四仰八叉地躺上舒适的大床,忠淑更是倾其美味,制造出空前盛宴。一家人面对窗外广阔的绿地,饮酒狂欢,大快朵颐。这家人的“寄生”已足够“生猛”。



触目惊心的一组“寄生”被揭开了面纱。朴家现有的豪宅,朴家并非原住,原住人是南官贤子。豪宅建造者为躲避有可能来自北方的进攻,而建有着隐秘的地下室,地下室有着曲折仄长的甬

道和应急的生活空间。但她在过手房产的时候却并没有让新主人知道这一切,而遗留下来继续为新主人服务的女佣雯光,便借机将开蛋糕店倒闭、欠债被追的丈夫秘密安置了进来,这也就是女佣雯光的饭量一人顶两人的原因——她得不断偷出东西,送给地下室的“寄生”者。她之

假如没有那场大雨

□张世勤

所以雨夜赶来,就是想趁着主人不在,去看看自己丈夫的死活。她所谓的走得急忘带一样东西,忘带的并不是东西,而是她的丈夫。这对“寄生”的夫妻竟让全家都是“寄生”者的金家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由此,朴主人家小儿子的古怪原因也便露出端倪,所谓一岁得病,不过是多颂一岁时在夜晚的餐厅遇见从地下室爬上来找东西吃的雯光丈夫。所以,多颂那些极具现代性和印象派手法的涂鸦,其实就是模模糊糊的雯光丈夫的影像,而每每画右下角都有的让人倍感莫名其妙

一场大雨,让主人提前结束了行程,提前8分钟打进来的电话,让两组“寄生者”的对垒变得更加糟糕。也许,富人家花钱雇佣,过着优渥的生活无可非议,但他们一旦离开佣人,日子仿佛也是一地鸡毛。从这个角度说,富人是否也是在“寄生”呢?

导演赋予“寄生”的肯定不只是生存问题,而是借由“寄生”这一概念,持续向社会和人性深处扩展和挖掘,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让人又想笑又想哭、无法赞美也无法批判、必须沉思却又抓不住理不清的尴尬的艺术文本,这或许正是影片的致胜之所在。

影片讲述的是地上、半地下和地下三类人交集的故事。一场大雨,对地上来说,可能带点诗意,但对半地下来说,便是一场灾难。基泽一家,基本处于全家失业状态,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半地下,抬头就能看见在自家窗外撒尿的醉汉,全家人早已浑身闻足了底层人身上所独有的发霉味道,但他们却毫无规划,最大的智慧全部体现在底层人缺乏法理和尺度的小聪明了。如

果说,基宇为能顺利成为有资格的家教而伪造学历还有情有可原,甚至为妹妹也能成为家教而向女主人谎称身份也或可理解,那么,妹妹基婷借朴社长司机送其回家,半路悄悄脱下内裤,使得司机不明所以便被解雇之事,便让人可惜。而且,随后当听说女佣对桃毛严重过敏时,一家人一起策划,相互配合,成功实施了对女佣的排挤。这其中,父亲和女儿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当在地下室两组“寄生”者不期而遇互握把柄时,也许正是他们可以互相接济和平解决争端之时,却发生了不该有的惨烈冲突。女佣雯光的死,也直接导致了其丈夫走上地面,以刀相向。宇婷身亡、忠淑与雯光丈夫死拼之时,朴社长捏鼻不愿闻他们下层人身上那股发霉味道的举动,又瞬间激起了基泽的愤怒,从而失去理智。这是一起由荒诞的社会现实引发的人性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之劣才是人的最大“寄生”。

因此在我看来,有没有那场大雨都已经不重要。即使那场大雨不来,即使根本不存在地下室的,单是一家四口,以不明身份进入到另一个四口之家中,即便是互相“寄生”,表面相安无事,也已经足够荒诞和恐怖了。

人性才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和“寄生者”,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跳不出千疮百孔、撒气漏风的这只人性篮子。一切社会秩序和文化文明,终究都要在与人性的不懈搏斗中艰难前行。